



胡同 九章

王彬 著

東方出版社

K921

13

2007

胡同 九章

王彬
著

東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胡同九章/王彬 著 - 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07. 1

ISBN 978 - 7 - 5060 - 2647 - 5

I. 胡… II. 王… III. 城市道路 - 研究 - 北京市 IV. K9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15461 号

胡同九章

HUTONG JIUZHANG

作 者: 王彬 著

责任编辑: 林 敏

装帧设计: 鼎盛怡园设计室

版式设计: 鼎盛怡园设计室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 址: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(100706)

发 行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: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版 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00 千字

印 张: 9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60 - 2647 - 5

定 价: 35.00 元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100706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(010) 65250042 65289539

再过一段时间，这本小书便与读者见面了。想到这里，总有些忐忑不安，同时还要说几句关于这本小书的话。此书分内篇与外篇两部分。内篇从九个方面探讨胡同的不同侧面，侧重于理论层面；外篇侧重于实践，讨论不同地区的胡同以及相关的四合院与王公府第，也是九篇。故而总名：《胡同九章》。

北京是六朝古都，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典范，也是人类建筑的精华。可惜的是，我们的认识不足，在少数学者呼吁保护的时候，大多人群还处于懵懂茫然的状态之中。这其中的因素是复杂的，而且至今仍然影响着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。如果说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曾经是政治因素，那么现在更多的则是经济因素的干扰，而不得不引发我们的困惑与思索。

基于此，我写了这本小书，试图通过我的体验与认知，为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提供点滴经验，如果能从中获得某种感悟，我则十分欣慰。

目 录

前 言 / 1

内 篇 / 9

第一章 胡同起源 / 11

第二章 胡同布局 / 19

第三章 胡同要素 / 28

第四章 胡同功能 / 34

第五章 胡同景观 / 40

第六章 胡同色彩 / 48

第七章 胡同名称 / 54

第八章 胡同人物 / 60

第九章 胡同文化 / 66





外 篇 / 73

请保留北京的胡同之根——砖塔胡同 / 75

南锣鼓巷地区文化寻踪 / 88

金丝套地区的历史故迹与胡同特色 / 98

金融街的历史地理 / 111

崇智门内外的微观地理 / 125

阜成门外的关厢地理 / 141

北京四合院的建筑布局与人文精神 / 159

北京的宅门与砖雕 / 178

清朝的分封、府第与国宅原则 / 189

附 录 / 205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北京消亡胡同

目录 / 207

胡同九章·内篇·英文版 / 222

后 记 / 276

前 言

《孟子·滕文公（上）》说：

方里而井，井九百亩，其中为公田。八家皆私百亩，同养公田。公事毕，然后敢治私事。

大意是说，一平方里的土地是一井。井是正方形的，一井有九百亩，划为九份，每一份是一百亩。中间的一份是公田，其余八份是私田。每一户农民拥有一百亩土地，八户农民便拥有八百亩土地。按照当时的制度，八户农民首先要耕种公田，之后，才能耕种自己的土地。《诗经》中“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”，便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制度在诗歌中的曲折表现。公田的主人是谁？奴隶主？还是农奴主？史学界有不同的诠释。但是，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如果在九百亩的土地上划出九等份，那么，表现在汉字上，必然是“井”的形状。这样的土地制度被表述为井田制，也就可以理解了。

为了耕种与管理，在井田制的土地上，农民要规划道路，挖出沟渠，定出边界。在边界上开沟启土，堆积土垣，称“沟封”，如果在沟封上种植树木，这样的树木，便叫做“封树”。

与井田制相对应的是用于居住的“里”。里，也是正方形的，也是九百亩，也规划为九等份，八份是居民住地，一份是公共用地，是祭祖、酬神和举行公共活动的场所。里，发展到一定阶段便是城市。根据成书于西周末年《考工记》的记载，周天子居住的王城，也就是首

都，理想的形式应该是正方形的，城里面设置九里，形同“井”字，中间的里，是皇城，皇城居于王城的中心位置；其余的里，作为百姓的居住之地，围绕在皇城的四周。为了方便里中百姓的出入，在里的四周开辟里门；同样，为了方便城中百姓的出入，也要开辟城门，每面三座，城门的设置是，南北相对，东西相对，全城共有十二座城门。

城门之下是道路。其中，南北之间有三条道路，称经；东西之间亦有三条道路，称纬。但是，城门之间的距离太大了，只在城门之下设道路，不便出行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于是在城门之间、城门与城垣之间、城垣内侧，构筑六条与干道相平行的次要道路。这样，无论是南北，还是东西，各有九条干道，时称九经九纬。

干道与次干道，在西周的时候称涂，后世称街。

皇宫以外，是普通百姓所居住的里。里的四周筑有高墙，四面设门，门临大道。在里的中心地带设置社坛，即里社。社的四周营建住宅，住宅按编户组织，以闾为单位。《周礼》说“五家为比”，又说“五比为闾”，二十五家为一闾。四闾为一族。也就是说，一族有一百户人家。每一族的住宅连为一排。住宅南北相对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在郑州商城发掘出里的遗址，半地下的房屋有组织地南北相向而建，彼此之间保持一定距离。这应该是里中的道路遗存。

里中的道路，在古籍中表述为巷。

《诗经》中收有一首题曰“叔于田”的诗歌，颂扬一位叫“叔”的青年猎人的豪迈与英武，诗共四节，第一节是这样的：

叔于田，
巷无居人。
岂无居人？
不如叔也。

洵美且仁。

转换成现代汉语是：“叔去郊外射飞禽，大街小巷都无人。难道真的无人住？谁都不如那阿叔，那么漂亮又慈仁。”

为什么无人？因为，巷里的邻居都到郊野看漂亮的“叔”打猎去了。

巷之外，还有支巷，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曲。这种在里中辟巷，住宅构于巷侧的格局，被后世保留下来，成为很有情趣的生活空间，而且转化为诗人吟咏的素材。唐朝建中年间，少年白居易来到长安谒见名士顾况，顾况见白居易如此年轻，便对他说：“长安米贵，居大不易。”及至见到：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的诗句时，立即改口：“有此句，长安居亦容易，老夫前言戏之尔。”话虽如此，年轻的白居易委实没有能力购买自己的住宅，只能借寓永崇里的华阳观，他在一首诗中描述那里的环境是：“季夏中气候，烦暑自此收。萧飒风雨天，蝉声暮啾啾。永崇里巷静，华阳观院幽。轩车不到处，满地槐花秋。”残夏的风雨把槐花催落，车马无踪，没有车轮碾压诗人的梦境，盈巷的槐花美丽极了。二十年以后，白居易在长乐里购得东亭。后来，又迁居到昭国里，由于官俸微薄，只能购买支巷（曲）边上的住宅，周围的环境也是“槐花满田地”，车马稀疏。对此，白居易宽慰自己是“务嫌坊曲远，近则多牵役”，偏僻自有偏僻的好处罢。巷这种充满幽静的生活情态的道路形式，元以后，在北京，以胡同的姿态出现。

至元四年（1267），元世祖忽必烈开始营建大都，九年以后竣工。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宏伟、最美丽的城市，辟有十一座城门。其中：

东垣辟三门。中为崇仁门，即明清东直门位置，在今东直门立交桥处。南为齐化门，即明清朝阳门位置，在今朝阳门立交桥处。北为光照门，位于现在的和平里北街东端，望和铁路桥址的位置。

西垣辟三门。中为和义门，位于今西直门内大街西端。1969年修建地铁，拆除明西直门箭楼，发现了被围裹在里面的和义门瓮城遗存。南为平则门，今阜城门内大街西端。北为肃清门，在今学院南路与西土城路交汇处。尚存瓮城残址。

南垣辟三门。中为丽正门，位于天安门南。丽正门之东是文明门，位于今东单路口南部。丽正门之西是顺承门，在今西单路口南侧。

北垣辟两门。西侧是健德门，在今德胜门外五里小关处。东侧是安贞门，在今安定门外五里小关处，俗称五路居。

上面谈到，按照《考工记》的设计思想，四面城垣应该各开辟三座城门，总计十二座城门。大都虽然遵循了《考工记》的理念，却只构筑了十一座城门，从而就令人费解。为什么会是这样？这要从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说起。刘秉忠，今河北邢台人，学问渊博，精通《易经》与《邵世经书》，深受忽必烈赏识。元的上都与大都均是他设计的。因此，元大都在城门的数量上违背《考工记》的定制，很可能与刘秉忠信奉邵雍之学有关。邵雍认为，阳主赢，阴主虚。阳在乾位“全用”，阴在坎位，“不全用”。故而南垣辟三门。坎位在北，而“北不全见，东西各半”，故而要略去一门，以示“北不全见。”又依据八卦方位，北为坎，“坎为隐伏”，其方位“重险，陷也”。正北坎是“坎入于陷则凶”，潜藏不露则吉，故而不在于大都北垣正中设置城门。

民间的说法是，大都是仿照两足（北面两门）三头（南面三门）六臂（东西各三门）哪吒的形体建筑的。时人张昱在一首题为《辇下曲》的诗中吟道：“大都周遭十一门，草苫土筑哪吒城。谶言若以砖石裹，长似天王衣甲兵。”便是指此。

大都虽然少开辟一座城门，但是，仍然遵照《考工记》的思想，开辟了九条南北干道与九条东西干道，只是南北中轴线的北端没有相对应的城门罢了。

干道或者次干道，其时称街。街有大街与小街之分。街以下的道路，一称火巷，一称胡同。胡同是蒙古语在汉语中的借词，原指水井。胡同一词虽然产生于元代，但是，以其为词尾的道路，并不很多，根据元人熊梦祥的记载，在大都，只有二十九条胡同，有名称流传到今天的只有西四路南的砖塔胡同，是北京胡同之根。

洪武元年（1368），明朝的军队攻入大都，出于防御的考虑，对大都进行了适当改造。但是，大都的干道基本保留下来，并且成为胡同布局的经纬，直至今日，仍然在为北京的现代化服务。

与大都相比，明代的北京，出现了大量胡同，围绕干道整齐排列。为了日照关系和抵御隆冬时节凛冽的北风，胡同大多采取东西走向，南北走向的胡同只占次要位置。相对于南北干道，胡同大多是垂直的；相对于东西干道，胡同则大多是平行的。今天被专家认可的大都胡同遗存，主要集中在东四、西四一带，基本是东西走向的胡同。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），一个叫张爵的人把北京的道路名称搜集起来，以《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》的书名出版。根据张爵的统计，在他的时代，北京共有一千一百七十条街巷，其中有四百五十九条胡同，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，几乎是大都胡同的十六倍。从此，胡同成规模、成建制地走进北京百姓的生活。胡同，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。

明代的胡同，不少保存下来。在名称上，有的至今没有变化，比如，王府井大街附近的金鱼胡同；有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比如，金鱼胡同北侧的干鱼胡同，今天谐音为甘雨胡同；有的变化则莫名其妙，比如，干鱼胡同附近的椿树胡同，后来改做柏树胡同，不知道是什么道理，难道这里的椿树，后来基因变异，长成柏树了吗？当然，也有的胡同消失了，这一带，有一条胡同叫长人道，现在完全没有可以寻觅的痕迹了。

崇祯十七年（1644）三月，李自成进入北京，但是，在清人的打击下，很快退出北京。九月，年幼的顺治皇帝进入北京，十月宣布“定鼎燕京”。对于北京，清人采取了全盘继承的原则，北京的城市格局没有变化，只是街巷的数量增加了不少。据统计，清代末年，在朱一新的《京师坊巷志稿》中，总计有二千二百一十一条街巷，其中有一千一百二十一条胡同，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。

1949年前后，北京城内的街巷达于高峰，其时约有三千二百一十六条街巷，一千零三十九条胡同，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北京的东城、西城、崇文、宣武四个城区，总计有二千三百五十二条街巷，其中有一千二百零四条胡同，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一。街巷的数量减少了，但是胡同的数量却增加了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？原因是，北京市政府1965年整顿地名，把许多标志性的地名规范化，在词尾缀以胡同二字。

如同其他城市，在北京，对道路的称呼也是有原则的。元人熊梦祥在其所著的《析津志》中，曾经指出，“大街二十四步阔，小街十二步阔”，认定大街与小街的根据是道路的幅宽。那么，火巷与胡同呢？可惜，没有记载。1965年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光照门一带进行钻探，发现那里的街巷的宽度约在九点二四米，相当元人的六步。有一种意见认为，这就是胡同的宽度。是否这样，有待进一步研究。但是，无论怎样，胡同狭窄于街，则是毫无疑义的。这个原则被后世继承下来。比如，鲜鱼口地区的道路可以分为四个等级：巷、胡同、街、大街。其中，巷的宽度一般在三米以下，长度为二百米至三百米，比如得丰东巷、得丰西巷。胡同的宽度为三米至五米，长度为三百米至五百米，比如晓顺胡同。街的宽度在六米以上，长度在五百米左右，比如西兴隆街、打磨厂街。大街的宽度在二十米以上，长度在一千六百米左右，比如前门大街。晓顺胡同为居民提供了安静的居住环境。

西兴隆街、打磨厂街两侧多商店。前门大街既是北京的南北干道，又是北京重要的商业区。

这种根据城市功能设计街道的布局，是十分科学的。我们很难设想，一座城市所有的街道都是一个尺度，很难说，居住在城市干道两侧的居住环境是幽美而适宜的，人类的居住要求安祥、静谧，北京的胡同则提供了这样的居住环境。如果说，北京的四合院是中国传统民居的代表，那么，胡同则是中国传统居住环境的代表，可惜，对此我们认识不够。我们更多的是从交通的角度考虑问题，胡同似乎只剩下出行一种功能了。这当然失之片面。胡同的本质是居住空间的组成部分，是四合院的延伸，是从公众场所到私密场所的过渡。人类的居住，按照古人的理想应该是“居之安”，胡同则提供了这样的理想形态。对此，我们的研究不够而流于表层，需要进一步探索。

近年，随着北京危改的提速，旧城区的胡同消失了不少，从而引起专家的忧虑。因为，胡同是北京旧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胡同的大量消亡，严重地影响了北京的古都风貌，专家的忧虑不能说毫无道理。进行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同时保留古都风貌，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。为此，我曾经提出微观地理学说，核心是注重新旧景观的谐调，把新与旧的景观统一起来。现在的问题是不统一，新旧对立，从而形成视觉障碍。专家的忧虑很大程度便在于此。因此，保护胡同，不应该只是消极的，而应该从积极的，微观地理学的角度进行保护、研究与构想。

至少，知道一些胡同的历史、胡同的要素、胡同的功能、胡同的文化，品味胡同，鉴赏胡同，享受胡同，从而给我们的生活添加一点历史与审美趣味，总是令人心情愉悦的事情。

内篇

〔第一章 胡同起源〕

〔第二章 胡同布局〕

〔第三章 胡同要素〕

〔第四章 胡同功能〕

〔第五章 胡同景观〕

〔第六章 胡同色彩〕

〔第七章 胡同名称〕

〔第八章 胡同人物〕

〔第九章 胡同文化〕

第一章 胡同起源

北京的胡同产生于元代，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。

元人李好古写过一出杂剧叫《张生煮海》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一个年轻的读书人带着书童，从潮州到大都赶考。这个年轻人，姓张名羽，表字伯腾。“生”，是年轻的意思，姓张，又是年轻人，于是在题目中简称张生。东海龙王的第三个女儿琼莲厌倦了海里的生活，渴望人间繁华，带着丫鬟，也来到大都。张生借宿在石佛寺，在晚间的时候，焚香弹琴，吟诗自娱。诗曰：

流水高山调不徙，
钟期一去赏音孤。
今宵灯下弹三弄，
可使游鱼出听无？

龙女闻琴而至，见到张生，两人很是爱慕。张生很想知道龙女住在什么地方，但是碍于情面，不好意思询问，便让书童问。由于身份悬殊，书童不可以直接问龙女，只能去问她的丫鬟。丫鬟回答了这样一句话：

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。

“兀那”的“兀”，是发语词，无确定含义。“那”，是指代词；